



# 美国动态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2011年5月15日(第7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 新闻动态

### QE2 结束会利好美国国债吗?

过去四个星期,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3.58%下降到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3.16%。虽然过去几个月的最大买主打算在6月底撤离,国债市场依然出现了上涨行情。国债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疲弱的经济数据推动的。在一些投资者看来,近期上涨行情说明,美联储第二轮大规模债券购买计划(即所谓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的结束实际上可能有利于债券市场,最坏的情况也就是对债市没有什么影响。如果经济增长放缓,压低大宗商品价格并减轻通胀风险,则QE2的结束有可能成为国债市场的一个利好因素。

券商 CRT Capital 国债策略部门负责人埃德尔(David Ader)说,如果 QE2 对股市、对风险资产、

对大宗商品泡沫起到了作用，那么 QE2 结束时，或许这些资产会走向相反方向，人们会购买更多国债。5 月份第一周股市和大宗商品重挫，进一步支撑了 QE2 结束反倒有利于债市的观点。

2010 年年初，债券市场随着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包括美联储斥资 1.25 万亿美元收购房贷债券的计划）的结束而上涨。当时经济增长不稳，投资者从股市逃往债市，收益率大幅下降。债券多头认为，QE2 的结束有可能使这段历史重演。

看空债市的人认为，不会有足够的买家进入市场，因此他们不足以取代不在意价格的美联储购买债券的力量，这就会迫使美国政府为其大额借款支付更高利息。

（来源：《华尔街日报》2011 年 5 月 10 日）

## 美国结束 QE2，市场将何去何从？

美联储的政策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当去年伯南克暗示美联储将购买 6000 亿美元国债之时，该项被称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第一轮国债购买行动称为 QE1，已于 2010 年春结束，当前正在发生的第二轮购买行动称为 QE2）的政策引起了市场的强烈反响。

QE2 政策的设计初衷是推高债券价格、压低利率，支持者称赞其可支撑经济增长、推升股市。现在，QE2 政策将于今年 6 月底结束，许多专家认为美联储推出 QE3（第三轮国债购买行动）的可能性极低，那么，QE2 结束后，美国国债市场就会出现巨大的需求缺口，到底谁能接手填补这个缺口呢？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资金规模达 2,400 亿美元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回报基金（Pimco Total Return）的投资组合经理格罗斯（Bill Gross）一直担心这个问题，他不仅不会接手，还将手中的美国国债全部卖出。都市西部资产管理公司（Metropolitan West Asset Management）的首席投资长里韦尔（Tad Rivelle）则认为 QE2 扭曲了市场，不仅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膨胀，还导致了低利率，QE2 结束后，债券价格回落，长期利率将上升。

许多专家预测股市的抗跌性比债市强，因低利率使得股票比债券有吸引力。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投资策略师齐德尔（Joe Zidle）建议专注于有望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经济走强中获益的市场领域，比如科技、能源、材料和工业。

策略师们还说，如果第二轮量化宽松的结束导致美国债券收益率上升，事实可能证明这是一个有利于美元的走势，因为这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当然，投资策略师并不是在建议把投资全部转成股票，因为需要在债券上有一定的投资，以便实现投资分散化，增强抗风险能力。

对持有大量债券的投资者来说，利率上升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美国的存款人将从中受益。也有人担心美国结束 QE2 会给新兴市场货币带来压力。

QE2 将在 6 月底结束，再加上欧元区利率上升，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势头逐步减弱，并将抑制新兴市场资产和货币的升势。

QE2 曾受新兴市场国家指责，因为美元流动性增加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同时拉高其资产价格。现在，QE2 将结束，全球流动性将下降，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的压力减轻，但又面临着市场振荡，甚至资金突然撤离的情况，这种不确定性又是一种新的挑战。外界对此看法不一，印度商业和工业部秘书高普兰(R. Gopalan)认为结束 QE2 会导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减少，俄罗斯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理解美联储提振经济的需要，但是他担心此举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风险。鲁比尼(Roubini)全球经济咨询公司的格鲁希纳(Gurushina)则表示，如果资金流入放缓，新兴市场货币可能会承压，同时会减少融资套利交易（在低利率国家借钱融资，然后在高利率地区进行投资），格鲁希纳表示，结束 QE2 可能会增强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结束该计划就可能引发人们对全球增长前景的忧虑，进一步讲，还可能令人担心新兴市场出口和大宗商品价格。实行 QE2 期间，美元下跌，投资者青睐大宗商品，现在要结束 QE2，美元利率上升，大宗商品会被抛售，从而导致其价格下跌。格鲁希纳还指出，QE2 或许有助于降低新兴市场资产等高风险资产的波动性，结束 QE2 可能导致市场振荡。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而且不会出现快速撤资，新兴市场国家的决策者就会松口气。美联储实际的紧缩进程可能是渐进的，而且资金突然大规模撤离新兴市场的情况也不大可能发生。所以一些看好新兴市场国家前景的大型投资者并未因此而动摇立场。

（来源：《华尔街日报》2011 年 4 月 25 日—26 日）

## 本·拉登的接班人

本·拉登之死是对“基地”组织的重大但并非致命的打击，这个恐怖组织在巴基斯坦境内有强大的同盟军，自 9.11 事件以来，“基地”组织一直处于演化之中，而且其分散化的组织结构使其不易受到削弱。但阿拉伯世界的变化比“基地”组织的变化还要快，拉登的继承者们得去适应这种变化，否则将被巴基斯坦和也门的基地组织排除在外而被边缘化。

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拉登相比，他近年来成了“基地”组织的公众人物，发表讲话更多，去年还写了一本如何推翻巴基斯坦政府的书。

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看起来能更好地领导“基地”组织，能适应阿拉伯世界创造新秩序的运动。他在也门的“基地”分支机构持续壮大，并见证了 2009 年“内衣炸弹”和去年秋天“包裹炸弹”的事件。奥拉基用英语出版的在线杂志，是第一份赞颂

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海啸”般巨变的杂志，他们还设计了方案，试图从中获益。

奥拉基毫无疑问将更多地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领导“基地”组织前行。

（来源：美国《新闻周刊》2011年5月5日）

## 击毙拉登之后，美国重估阿富汗战略

拉登被击毙之后，美国开始重新评估阿富汗战争乃至更大的反恐战略。国会、军方、奥巴马政府围绕着目标、战略、成本、授权等等已经有十年之久的老话题进行了辩论。

参议员克里（Kerry）和卢格（Lugar）建议采取一些必要的渐进性的步骤，让阿富汗当局来接手反恐的任务，两位参议员都反对美国迅速撤离阿富汗。卢格参议员还要求对美国一个月在阿富汗花费 100 亿美元是否有助于实现美国的全面地缘政治利益作重新评估。

五角大楼的一些人认为，与其把拉登之死作为一个撤军的借口，不如继续现行的阿富汗战略，获取更多的利益，并迫使塔利班坐到谈判桌旁寻求政治和解。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则谋求通过一个法案，授权政府用军事力量进行反恐战争。这可能被认为是自 2001 年以来国会向行政部门让渡权力的继续。

奥巴马总统将开始考虑能否更好地执行美军 7 月份从阿富汗撤军的承诺。

（来源：《纽约时报》2011年5月10日）

## 美国重新思考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拉登死后，美国高官对美巴两国的未来关系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拉登的藏身地离巴基斯坦首都都不远，使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士难以容忍巴基斯坦与极端势力之间的暧昧关系。美国感觉到长期以来对巴基斯坦的警告没有奏效。

美国官员认为他们没有证据证明巴基斯坦高级军官或文职官员知道拉登的藏身地或提供了军事支持，但拉登的驻地离巴军如此之近，这使得两国关系面临着危机。一些人要求对巴基斯坦采取报复措施，另一些人则强调美国今后应更多地依赖单边行动，但也有一些人要求继续维持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奥巴马则表示：“我们在巴基斯坦领土上击毙的恐怖分子比在其他地方要多，没有巴方的支持，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对两国关系的走向，美国政府处在一个犹豫和过渡期，仍在等待巴基斯坦对一些问题的回应。巴对美利用其领土打击塔利班颇有微词，认为这种做法会使巴的周边环境恶化。巴政府

的一些官员也对美国认为巴基斯坦与拉登有牵连感到吃惊和不满。

（来源：《华盛顿邮报》2011年5月15日）

##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讨论经济和人权话题

5月9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幕，会议为期两天。

在对话的开幕式演讲中，美中两国官员都表达了加强两国合作、妥善解决两国间分歧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表示，一年一度的美中对话，给予两国一个机会讨论它们的分歧，这就像朋友之间的讨论一样——直接而坦诚。她说：“我们已经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说得很清楚，我们关注人权，我们担心这一问题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和地区政治与稳定的影响。”就此话题，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9日在讲话中说，中国已经在人权方面取得了进步，他力邀美国人到中国去看一看。他说，去中国参观，美国人能够亲身体会到中国包括人权在内的诸多领域中取得的进步，并能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

在市场准入方面，两国将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并在平衡全球经济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中国想让更多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并要求美国放松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美国认为中国不够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使美国等外国公司很难与中国的企业竞争。克林顿表示，能否成功取决于在对两国都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双方能否将美好的言词转化为坚实的行动。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说，两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都取得了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而言，挑战来自于能否将出口驱动型的经济转变到新的经济模式上来，即一个依靠内需的、灵活的、市场调节汇率的、更加开放的经济。盖特纳在谈论长期财政改革的时候表示，对美国而言，挑战在于解决诸如失业问题、促进教育和创新等方面。

双方还讨论了范围广泛的其他议题，比如朝鲜和伊朗问题等。

（来源：美国之音网站2011年5月9日）

## 美国副总统拜登说美中关系将塑造 21 世纪

正值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美国副总统拜登(Biden)表示，鉴于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在应对贸易问题、气候变化、安全等各种挑战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性，美中两国的关系将为塑造 21 世纪发挥重要作用。拜登于 5 月 9 日在华盛顿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一起发表

讲话。拜登说，从 2009 年开始的年度对话是为了“建立两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拜登说：“我们如何开展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确定我们如何应对世界在 21 世纪初面临的各种挑战。”拜登着重指出，美中两国是世界上能源的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这既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挑战，又提供了“共同努力寻求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重要机会”。他还表示，双方需要作出共同努力以找到双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同时也需要讨论人权等存在“重大分歧”的领域。奥巴马政府坚定地认为，保护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促进任何社会长期稳定与繁荣的最佳途径”。在这方面，中国已作出国际承诺，例如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而且在本国的宪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国务卿克林顿也表达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

（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2011 年 5 月 9 日）

## 美媒关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5 月 9 日至 10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提到了王岐山要求美国就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提供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纽约时报》报道了中美两国就金融、投资等问题达成的共识。《华盛顿邮报》注意到两国军方首次参加了对话，并报道了王岐山和盖特纳签署的经济合作全面框架协议，《波士顿环球报》和美联社都援引了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的观点，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状况”，北京更加自信。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的北京将在对话中处于上风。”

（来源：上述媒体 2011 年 5 月 9 日—12 日）

## 第三轮对话结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谈对分歧的看法

美中两国本周在华盛顿的对话结束后，中国官员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增进两国间对话的坚决支持。刚刚结束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凸显了两国在广泛领域内存在的重大分歧，包括汇率改革、贸易、人权问题。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强调，对话是解决分歧的一种重要方法。她说，只有通过对话，两国才能增进互信，妥善处理分歧和解决问题。对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本周关于中国人权的指责，姜瑜显得泰然自若。她说记者片面地理解了克林顿的评论，她强调了两国间的合作精神，并且大部分新闻报道都对这次对话持积极的看法。

姜瑜还谈到了两国在能源问题上的合作，她说中美在 2008 年已就能源和环境问题签署了为

期 10 年的协议。

（来源：美国之音网站 2011 年 5 月 12 日）

（编译：江宏春）

## 焦点分析

### 开放门户——使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益处最大化\*

荣大聂（Daniel H. Rosen）和提洛·赫恩曼（Thilo Hanemann）

#### 摘要

未来十年，中国资本寻求海外投资机会将出现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美国人需要对这种资本流动作出反应。国外对华直接投资——合并、收购以及“绿地投资”——在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国外对华直接投资接近 1 万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公司的投资约为 500 亿美元。然而，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起步较缓。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依然集中在获取原材料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少有中国的公司梦想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这是因为这些公司的国内市场不断增长，而在美国投资办厂所面临的挑战令他们望而生畏，因此它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美国投资。

由于当前中国公司在国内的竞争和盈利状况正在迅速地改变，它们去美国投资的动机也在发生变化。毋庸置疑，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无论是在投资价值还是在数量上都迅速增加。来自中国的企业目前在全美 50 个州中至少 35 个州开展业

---

\*2011 年 5 月 4 日，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以及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the 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联合发布了一份特别报告，该报告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最全面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该报告的摘要部分加以翻译，供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务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投资领域遍布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数十个行业。官方的数据倾向于隐藏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那就是美国已经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敞开了大门，并且中国对美投资正在不断增加——仅 2010 年就多达 50 亿美元。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创造的实际就业岗位有可能超过 10,000——数倍于官方估计的数值，并且这仅仅是开始。如果中国仿效其他新兴国家的海外投资模式，那么截至 2020 年，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直接投资总额将超过 1 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将流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市场。

然而，不断增长的中国投资让美国人感到喜出望外的同时也引起了他们的担忧。近几年，中国主要的对美投资计划几度受挫，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敌对因素。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CFIUS）是依法成立的负责审查外国投资是否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机构，通常情况下都能够公平合理地履行职责。尽管如此，美国国会的干预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负面舆论宣传，传递出了令人困惑的模糊讯息，阻碍了中国投资者赴美投资的意愿。现在，每宣布一个中国对美投资提案，媒体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该投资提案能够创造多少就业岗位，而是华盛顿的团体是否会阻挠其通过，不管其是否真的会给美国造成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中国投资协议都不在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审议范围内，而那些接受该委员会审查的投资协议往往都经过了适当的听证程序。此外，因为这种不友好的态度吓跑了美国所需的合法投资，招致他国对美国公司的报复，还使美国人难以集中精力对真正的安全威胁进行评估，因此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外国投资者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里，日本的例子非常具有启发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对美的首批投资就像今天中国对美投资一样，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日本企业在美子公司对美投资达到了几千亿美元。今天，在这些日本公司工作的美国人接近 70 万。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近期对美直接投资的增长证明了中国巨大的对外投资潜力，但是鉴于到目前为止出现的政治阻力，除非采取措施恢复以往清晰的思路，不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益处就有可能被浪费。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目的是通过维持最好的安全审查程序，始终敞开美国的大门迎接日益开放的中国所带来的好处，并积极地吸引来自中国的适当投资，确保美国人享受到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益处。

在此，我们对这些建议作如下总结，并在本报告的结论部分作详细阐述。

### **1. 两党发出明确的信息，表示欢迎中国赴美投资。**

尽管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数额每年都在成倍增长，但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美国对此的反应并不热烈。在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上，华盛顿方面应当重掌主动，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健康增长态势，并表明美国的政策将一如既往地给予方便。有必要联合两党发表一

份国会及政府执行层面的声明，传递出支持中国增加对美投资的明确讯息。尤为重要的一点是，鉴于国会履行监管职责，并且近期在外国对美投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国会应当在讯息传递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2. 制定制度促进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

有必要重新审视美国为吸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所作的工作。目前这种听之任之的做法源自那个由美国主导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走势的时代；这种做法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在吸引外国投资者方面依然优势明显，无可匹敌，仿佛所有的外国投资者都来自不需要太多具体援助的国家。然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必要采取更多积极主动的措施，不仅是在州和地方政府的层面——它们正在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且是在整个国家的层面，因为外国投资在美国遭遇了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投资壁垒。

## **3. 保护投资审议流程免受政治干扰**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对外国赴美投资的审议流程大体设计合理，但是目前亟需对这种审议流程加以保护以免于被政治化。如果不能消除政治干扰，那么本报告中所列出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一些好处——如创造就业机会、使消费者受益，甚至是对美国的基础设施更新所作的贡献——将面临被转移到美国的竞争对手那里的风险。

中国国内一些人士建议美国应该效仿中国的做法，发布一个开放产业目录。鉴于中方人士近期的一些投资受挫经历，他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并不适合美国。对于每一种产业而言，都有可接纳和不可接纳的投资，也不可能提前预测到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不应当质疑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是否另有企图或是某一产业是否易受影响，而应审议具体的投资协议是否会对美国的国家完全构成实际的威胁。简而言之，现有的审查流程应当受到保护。

外资审查委员会应进一步提高其决策过程的透明度，设法使海外投资者相信委员会所进行的审查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于那些主张以更多的政治干预——例如，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纳入审查范围——来改变现有审查流程的呼吁必须加以反对。

## **4. 更好地理解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动机**

许多美国人——包括华盛顿的众多官员——认为由于中国有着大量的国有企业，因而市场力量和盈利动机并不完全适用于这个国家。因此，他们怀疑中国公司赴美投资可能是出于某些政治目的，而不是单纯为了赚钱。

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如果要想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纠正这样的错误观念。在国家主

义和政府规划的说法背后，中国的公司通常还是把自身利益和盈利放在首位，要阐明这一点并非易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拥护者和受益者——包括交易促成者、投资合伙人、销售方以及涉及的地区——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来阐释中国企业的市场导向。通过发布上文提到的那种两党联合声明，美国的决策者们可以引导民众重新评估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动机。当然，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人士也必须加倍努力让美国的领导人和普通民众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投资动机。

## **5. 就中方应承担的责任与其进行沟通**

美国会对中国的投资动机有如此深的疑虑，中国也有一定的责任。毕竟，在国有企业里，尤其是占据近半数工业资产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商业决策经常要服从政治考量，高层主管有责任听命于党。即使是在私营企业里，不透明的管理行为也很常见。尽管这种不透明也许更多的是为了掩盖特权人士的收益，而不是出于其他目的，但美国方面负责审查外国投资的人员不可能像中国的监管者和官员那样，对此视而不见。如果中方希望中国公司的对美投资计划在华盛顿接受更为直接的听证过程，它就应当改善国内企业的管理状况。

一些评论人士宣称华盛顿方面不正当地阻碍了外国公司对美投资，我们建议美国官员一方面要驳斥这种批评，另一方面呼吁中国大力增进公司治理的透明度，以便监管机构开展工作。其他一些措施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使中国的监管机构与受监管的企业更明确地分离将有助于缓解外国的疑虑。在中国的市场竞争政策中引入以消费者利益为核心的评估标准，可以使外界相信中国公司的商业行为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而非由政府的意图来决定。

当然，如果中国废除国家资本主义，美国的官员就不会如此担忧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意图，也不会忧虑受北京方面影响的中国公司可能怀有“掠夺性”目的。但是美国人不能指望中国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同时，应当明确的是，虽然美国十分欢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但是美国监管机构谨慎选择投资者的做法也是无可厚非的。

## **6. 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

在非传统经济威胁方面，美国担忧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使中国的角色从价格接受者转变为价格制定者，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鉴于中国对外投资占全球份额的不断增加，如果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及其人为定价机制（如金融压制下的资本成本）在未来会对全球市场造成不良影响，那么就有必要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建立一个类似于贸易领域的反补贴机制。我们猜想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中国现有的国家主义偏好就将终止，但不能完全肯定。对于如何评估一个国家内部的资本成本对世界价格的“不当”影响，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因此，我们建议全世界一起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就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

## 7. 不要采取报复性做法

“报复性”这个词被过于频繁地用在中国对美投资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如果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对华投资，中国实施差别对待，那么美国就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我们建议要慎之又慎地采取这种报复性手段。中国对于流入本国的外国投资确实施加了限制，但数十年来，中国政府在开放、吸引外国投资方面一直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如果中国不进一步开放外资进入，美方就将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这种想法是愚蠢的，也有悖美国的利益。当然，美方谈判人员必须在谈判中敦促中方对美国的投资更加开放。但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必须将这种谈判与是否允许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入美国区别开来。无论中国的决策者们在外国对华投资问题上表达了怎样的观点，美国都应该欢迎来自中国的资金。30年来，不管外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如何，中国通过敞开大门欢迎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而变得越来越强大。美国也应该这么做，否则本来可以落户美国密歇根州或埃尔帕索城（El Paso）的中国企业，就会跑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或墨西哥的华雷斯市(Juarez)去了。

## 8. 处理好国内的事务

最后，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外资流入与否并不表明国力的强弱。外来投资，无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由于各种原因早已进入美国。寻求以低廉价格购入破产企业资产的投资者蜂拥而至。另一方面，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活力和稳定性吸引了大量投资者来到美国。未来，只要处理好国内的经济和政策问题，美国就将吸引到最需要的外国直接投资。

一些人担忧中国会将持有的美国国债兑现，转而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中国在增加对美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在增加对美国债券的投资。中国是否会继续这么做是一个商业问题——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提供优越的投资机会——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美中经济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过去，绝大部分的直接投资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世界”，例如从美国流向中国。今后，在外商继续投资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将大量进行对外投资。美国对这种重大变化的适应力如何会对其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利益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为更为广泛的美中关系奠定基调。本篇报告，旨在通过剖析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模式、动机和潜在影响，帮助美国在不牺牲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中国投资兴起所带来的益处。

（来源：美国亚洲协会网站 2011 年 5 月 4 日）

（王子磊译，吴其胜校）

编辑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编辑： 郝玥  
通讯地址： 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社联大楼 203 室  
邮编： 200020  
电话： 53064520  
工作邮箱： meiguodongtai@163.com